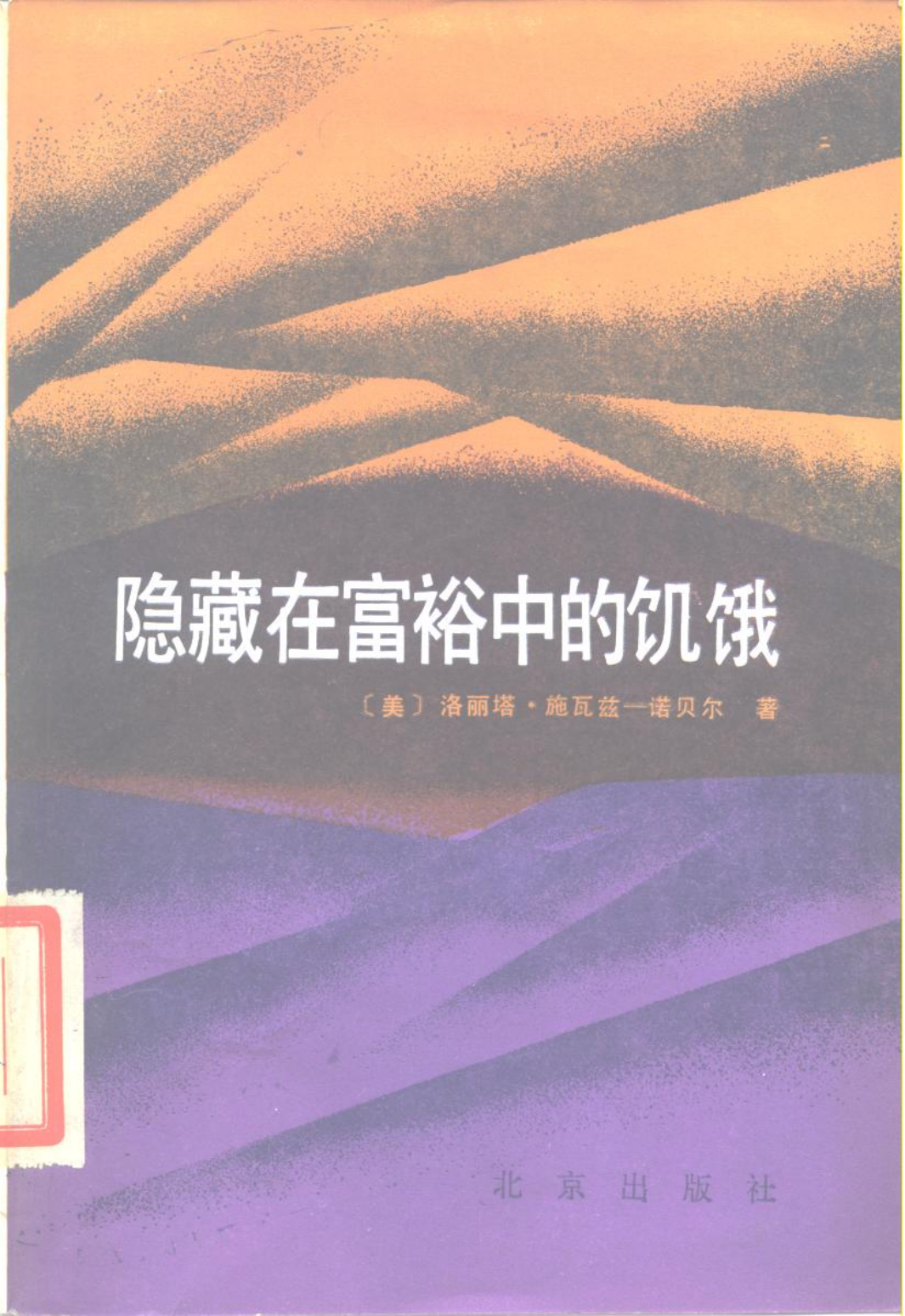




隐藏在富裕中的饥饿

〔美〕洛丽塔·施瓦兹—诺贝尔 著



北京出版社

隐藏在富裕中的饥饿

〔美〕洛丽塔·施瓦兹—诺贝尔 著
方 欣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69128

北 京 出 版 社

969128

**STARVING IN THE SHADOW
OF PLENTY**

LORETTA SCHWARTZ—NOBEL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1

隐藏在富裕中的饥饿

〔美〕洛丽塔·施瓦兹—诺贝尔 著

方 欣 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二 厂 印 刷

*

3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625 印张 135,000 字
1984 年 6 月第 1 版 198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00

书号：10071·525 定价：0.65 元

谨以本书献给玛瑟·萝卡以及这个国家所有那些孑然一身死于饥饿、并期望这类无谓的苦难也将随之告终的人们。

内 容 提 要

1980 年美国总统里根的国内事务总顾问宣布：美国已彻底消灭了贫穷。本书作者以七年时间，遍访全美各地，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揭露了这一谎言，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富裕中的饥饿的悲惨景象。

目 录

第一章 现在的问题.....	(1)
一、饥饿之因.....	(1)
二、慢慢地死去.....	(20)
三、中产阶级与饥饿.....	(35)
四、饥饿的政治问题.....	(53)
第二章 日益严重的饥饿威胁.....	(76)
五、经不起风浪的美国农民.....	(76)
六、要食物还是取暖.....	(94)
七、核能与饥饿.....	(104)
八、毁掉了土地.....	(116)
九、毒化了食物.....	(135)
第三章 解决问题的方法.....	(145)
十、负起责任来.....	(145)
十一、结束饥饿.....	(156)

第一章 现在的问题

一、饥 饿 之 因

我是偶然发现她的。那天她为了能取到食物正试着从房门里爬出来，再沿着破碎的混凝土台阶爬下去。她已经八十四岁了，独居在南费拉德尔菲亚城第九号街和本布里支街拐角处一间看来象是被废弃的房子里，这所房子离我市内舒适的住所只有一英里之遥。她戴着一顶用线钩织的帽子。很久以前，当她丈夫还健在，她还能走路时，她曾传授过钩针编织技术。她的姓名叫玛瑟·萝卡。她已濒临饿死的边缘了。

1974年的一天下午，我和七岁的女儿吕贝卡一起到当地的超级市场为萝卡夫人购买食物。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每逢星期六的下午，我们总要给她带去几袋食品，这已经成了我们的惯例。吕贝卡把这看成是一星期中最美好的一天。在这种给予之中，有某种东西感动着她，并使她快活。当玛瑟·萝卡笑得眼泪顺着脸往下淌，一边连声说道“谢谢，谢谢，宝贝，我感到好点儿时，还要编织些东西”的时候，吕贝卡会感到由衷的高兴，相信我们正在解决饥饿的问题。就在这时，我遇到了住在附近的朱丽亚。

朱丽亚的体重已从一百五十磅下降为九十磅，她住在一条

狭窄的小巷的一头，在这条小巷的两边，已修复的房子和破旧的房子并肩而立。她坐在家门口一张绿色的破塑料椅上，盼望着，而且总是这样盼望着有人会去拜访她。她身着经常穿的那件深蓝色衣服——这是她仅有的两件衣服中最好的一件。她从漆黑的房子里抬头凝视着我，然后微笑了一下。她没有牙，两个大脚趾从破旧的草编拖鞋里露了出来。她把我让进屋里，坐在她睡觉的那张躺椅上。我感到脚上有什么东西，就不由自主地想把它掸下去，这时，我看到了那些东西——好几百只蟑螂穿过肮脏的绿白色亚麻地毯，沿着褪了色的花纹墙纸而上，爬过那印有圣经故事和费城教区大主教约翰·卡迪诺尔·克罗尔摆开姿态微笑的日历。到处都是蟑螂。假如朱丽亚的厨房里还有食物的话，蟑螂也会在她之前把它吃光。

朱丽亚耳聋眼花，这或许是件幸事。为了表示对我的热情，她抬起一只胳膊，指着一张褪了色的全家合影。她那时只有二十一岁，年轻、丰满，脖子上挂着一枚银十字架。

“我是一个高圣公会教徒，于1899年6月28日在坎姆达（新泽西州）受的洗礼。现在家里除我之外再没有别人了。”她悲伤地说：“所以我知道，上帝把我留下一定是有什麼目的。”

我不禁想知道，上帝把她留下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你有很多食物吗？人们会去商店为你买食物吗？”看到她这样瘦，我问道。

她的声音变得沙哑起来。“没有，”她哀伤地说，“根本没人上这儿来”。

一个星期六，她曾试着去一家当地的超级市场，但她绊了一下，跌进了路旁的阴沟里。她躺在那儿，好久才有一个男孩来到跟前，把她扶了出来。在一个星期二，她又试着去了一趟。这回她到了那家商店，并设法买了几样食品，可在回来的

路上，有人把她买的一袋食品抢走跑掉了。打那以后，她连试都不敢试了，因此她就坐在那张置于蟑螂包围之中的破绿塑料椅上，等待着那些从来不会上门的客人，始终耐心地等待上帝告诉她，把她留在尘世的特殊原因。

我知道，吕贝卡和我会把朱丽亚加到我们的名单上的，并把她和萝卡夫人的食品一起在星期六带去。我们能够帮助她们，但我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得知，仅在费城一地，就有成千上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急需食物。

他们是隐藏在美国的富裕之中，被忘却的穷人。他们的身份政府已有记载；政府的计算机中储存着有关他们的数据，政府的档案柜里也有他们的档案。当十年前的1964年，林登·约翰逊总统向贫困宣战的时候，曾把他们作为贫民包括在内。

但是约翰逊政府没有实现对这些穷人、饥民所许下的诺言。在以后的1969年，尼克松的一位国内问题高级顾问理查德·伯恩斯狂妄地宣称，贫困只不过是“根据虚假的数字得出的一种理性的概念”。

1974年12月，我偶然地见到了几张隐藏在这些“虚假的”数字后面的面孔，从这些面孔上，我看到了痛苦，看到了人类的不幸。我所看到的東西使我改变了对美国的幻想。当我回到费城的大街，看到人们中午坐在收费昂贵的饭店里，笑着、呷着鸡尾酒，吃着龙虾时，我感到他们一定不知道，他们的邻居们正在忍饥挨饿。

多年来，我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连我向之求教的费城济老协会的公共关系理事也是如此。她告诉我，她的一生几乎全是在费城度过的。她还说，当她在南费城的小巷里发现那些只有一、二个房间的简陋住所时，简直震惊得发呆了。她解

释道，住在这些地方的大部分是白人，那儿时常不是没有暖气、水源，就是没有煤气或食物，他们完全与世隔绝。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通常都没有收音机或电视机，他们听不到公益服务机构的通知。即使听到了，许多人也没有电话；有时他们根本就不敢通电话。

在她的提议下，我搭上了一辆该协会提供的运送免费午餐的货车，这项计划是联邦政府资助的，其中一部分是为了给处于贫困线的适龄退休公民提供每天最低需要食品量的三分之一。就在这次我认识了埃迪。

一路上，阿耳伯特·爱因斯坦医疗中心的营养计划部主任乔安娜·施瓦兹告诉我，一次当她沿着这条街给一位老妇人送食物时，一个男人从家里跑出来告诉她，埃迪恐怕快要死了。实际上，埃迪有个姐姐，但她住在费城东北区，从来不去看她弟弟。接受免费午餐的大部分人都处于这样的境地——不是无家可归，就是被家人忘却，遗弃了。

我们把车停在南费城的意大利人聚居区，然后步行到街区尽头。这片街区是由一排排破旧但收拾得很整齐的住房组成的。我们走到一家看上去象是用木板搭成的街角商店，叩了叩门。

埃迪正坐在床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消磨过去的。因为他行走、穿衣、洗澡都不能自理。他就这样坐在那里，两条消瘦的腿从一条几个月未换过的床单边上无可奈何地耷拉下来。他身上盖的那条肮脏的床罩上全是苍蝇，他的周围堆着空花生罐头、脏杯子和用过的擦手纸。稀疏的金发一缕一缕地越过他那高高的前额，搭在与他轮廓清晰的面孔相配的那副大大的银边眼镜上。看到我们，他的上唇颤抖了起来，身上的肌肉也由于兴奋而绷紧了。埃迪年龄不大，只有三十八岁。我

们后来得知，这是给他带来的麻烦之一。

“嗨”，他说道，抬起一条胳膊，然后又让那只瘫痪了的手靠在他光着的胸部上，“能见到你们真高兴。”

埃迪和他年老体衰的叔叔住在一起，他很爱他的叔叔，总试着去照顾他，但只有七十四磅重的埃迪自己还需要别人的照顾呢。他们一起建立他们所能建立的世界。总的来说，这可是一个需要依靠别人的仁慈才能维持的世界。有时，一个邻居会来到这里，把埃迪背到浴室去，或帮他打开一罐福利部的一位主妇每周访问时带来的食品罐头。

“告诉我那个主妇都干了些什么。”乔安娜小声说道，“看看这块地方，再告诉我她都干了些什么！”

我看了看。亚麻地毯上覆盖着一层层的油渍和灰尘，简直看不出原来是什么颜色的。埃迪的汤姆叔叔吃饭用的桌子仿佛好几个星期都没擦过。埃迪说食柜里还有吃的东西，但他由于没办法取到这些食品或使用一把开罐头刀，他只有在碰到今天这样的机会或某个邻居来到时才能吃到东西。最近，他住了两个星期医院，这是他几年来第一次一天能够吃上三餐和睡在一张干净的床上。

乔安娜把埃迪这个星期应得到的五份午餐中的一份递给了他。他看看那些沙拉、鸡和果子冻，没有张嘴就吃。他知道，我是为了某种原因才去看他的，当处于象埃迪那样的困境时，一个人的来访可是一件大事。

我们谈了一会，然后他尽力提高嗓门说道：“对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真是感激不尽。”我猜他指的一定是那些午餐了，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别的什么也没做。

就在离开之前，我注意到了悬挂在他的铁床上方的一个镜框，里面有一张身着白袍，高举双手祈主赐福的基督画像。我

明白，对于埃迪和我今后还会遇到的许多处于困境的人来说，虔诚的宗教信仰是维持生存的精神支柱。

可实际上，埃迪的生存还依靠另一种支柱，这就是济老协会提供的五份午餐。但只有三十八岁的埃迪，还够不上是适龄退休的公民，乔安娜是不应该给他提供食物的。

乔安娜不准再冒任何风险了。她曾试过一次。她以前曾给住在南费城温顿街的一位老人送过食物。她还同时给这位老人的妻子送食物，但她的妻子不足计划规定的年龄。老人突然不见了，他的妻子怎么也不肯说出他的去处，她开始变得爱闹别扭，并且闷闷不乐。于是，乔安娜就故作姿态，不再给她提供午餐。五天之后，这位妇女死了。

在那条路线上有二十五个送饭点，这个机构每天送一餐，一个星期送五天。这五餐就是大部分人每周的全部食物。没有人知道，在费城的这个地区还有多少人在忍饥挨饿。从这点看来，我认为埃迪可以算是幸运者之一了。

我开始调查费城的饥饿情况。在与联邦和私人机构的接触中，我发现，联邦政府已经削减了前年分给费城济老协会的配给物。该协会全年只工作了大约八个月。由于在这个地区存在严重的营养不足问题，联邦政府曾根据美国老年人法给予最优先配给权。首先计划在这个城市中较贫困的地区建立一系列的午餐室。

午餐室开张的那天，许多人来到后把食物放进口袋转身就走，带回家去就餐；所有的食物都分发完了，还有不少人试着得到更多的食品。

已经建立的十三个午餐室很快就变得拥挤不堪，以致大多数午餐室不得不拒绝发放食品。然而，我们访问的位于费城东北区的巴斯特莱顿大道的那个午餐室，却能让每个人都吃上一

份午餐——虽然每个人所吃的都要少一些。“你可以把汤冲得稀一点，面包我们可有不少。”那儿的管理人解释道。把规定给一百个人吃的食物陆续分给二百个人吃了，因此营养补充只有成年人每日最低需要量的六分之一。但这也比没有强，所以人们还是上这儿来。

许多在巴斯特莱顿午餐室就餐的人，都是本世纪初从东欧来的犹太移民。那时他们虽然忍饥挨饿，但却充满了幻想：黄金铺成的街道、兴旺的私人企业、可以不愁衣食了。他们是自豪、温顺而又知足的人，然而他们还是有所需要的。许多人依靠每月只有九十一·六〇美元的社会保险金维持生计，这点钱在1960年都不够维持生存之用，更不用说在通货膨胀的70年代中期了。

他们坐在打牌用的桌子四周吃饭，男人通常身着西装，系着领带，妇女们穿着印花服装。他们坚持让我们分享他们的食物：一点通心面条，一个肉馅汉堡包和一些杂合菜。这不是他们爱吃的，而最符合犹太教规的清洁的食物，对于以圣经为行为准则的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

我问一位矮小的老人，他家是否还有什么可以当饭吃的食物，他耸了耸肩膀。“我只吃清淡的东西，这对我来说足够了。我跟你讲，如果你献身于犹太教教义的话，你就会经常得到精神食粮”。

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是从纳粹德国逃亡出来的，很久以前就体会到饥饿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要想知道巴斯特莱顿大道的午餐室为什么对任何人都是来者不拒，就必须懂得这一点。有一户一度曾在维也纳是很知名的人家——三兄妹和他们的母亲——也在那里吃饭。有一次，午餐室的女管理人员问这家的兄长是否愿意在此熬夜，吃上一顿专为男人准备的夜餐。他告

诉她，如果他的姐妹和妈妈不来的话，他是不会呆在这儿的。大战以来，他们从来就没分开过。

尽管午餐室的管理人员都竭尽全力地工作，还是有许多人挨饿。那年秋天，这个午餐室不得不关闭两个星期；也供应过一些食物，但不是人人都能吃到。在那两个星期中，四个人饿死了。

周末也不供应食物。大部分人既饥饿又孤独；对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来说，午餐时间呆在午餐室是一个社交机会。在周末期间，能够上亲戚家串门的只有一些最幸运的人。一个男人曾到过当地一家饭店，享受一下食物的香味，看看熙熙攘攘的人群，可买不起什么东西。

在我初访的那天下午，我遇见一位名叫利厄的又瘦又小的老妇，她肩上披着一条干净的黑色披肩，脚上穿着一双矫正用的皮鞋。吃饭前，利厄从她的包里拿出一个小塑料罐。她全身颤抖着——我听说她总是这样——十分费劲地拧着罐盖。最后她终于拧开了。利厄小心翼翼地把她分到的面条、汉堡包和蔬菜的一半放进罐里。这样，那天晚上她就可以充饥了。

利厄告诉我，她到美国后曾在一家工厂干过多年。现在她每月收入一百零四美元的社会保险金，其中七十五美元要付房租。这样，她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一美元。所以当她说她是一个吃清淡食物的人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在我们交谈的整个过程中，利厄始终握着我的手——紧紧地握着，这表明她需要的不只是食物。道别之际，她亲了亲我，说道：“再来啊，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美国。”然后她不厌其烦地抱歉说，她的英语说不好，耳朵不中用，眼神也不济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这些挨饿的人和我所发现的他们的

处境，发表在《费城》杂志的圣诞节版上。

几个月之后，我因这篇文章去华盛顿接受罗伯特·肯尼迪新闻奖。当埃塞尔·肯尼迪递给我一座上面刻有“献给贫穷问题的优秀报道者”字样的她丈夫的半身铜像时，我注视着那些参议员、国会议员以及新闻记者所组成的观众，我真想告诉他们，我并没有“掩盖”^①这个问题，我只不过刚刚开始报道这个问题。我想让他们知道，象玛瑟·萝卡、朱丽亚和埃迪这样的人，在美国比比皆是。但此时埃塞尔·肯尼迪正和我握手，祝贺我，所有的参议员、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都在鼓掌致意。然后，就座的时候到了。

我回家后不久，就遭到了一次个人生活方面的打击。我十四年的婚姻生活结束了。我个人的安全看来不牢靠了。我和我的孩子不得不找一个便宜的地方去住。这意味着，我得住到这个城市中更为贫穷也许也更为危险的地方。我所写过的那些人的生活条件与我个人的生活条件似乎不那么遥远了。我开始懂得，我们每个人的“安全”地位是多么脆弱。

我见到了如此一个社会中一些个别的受难者，这个社会不惜任何代价致力于发展，却顾不上那些最无依靠的成员。我还需要磨练多年，才能真正认识到美国社会中的这种困境的实质。

我还不知道，那些生活优裕的美国人，是否有一天也同样会成为这些冷淡、贪婪、盲目，以及虚伪的政治和经济的牺牲者；这已经使得他们的邻居在忍饥挨饿。

同样我也没有认识到，我所见到的那些贫困和饥饿只不过是国家虚弱的一种现象，而这种表现为社会不公正的虚弱已经

^① 英语中 cover 这个词有掩盖和报道两个意思，作者这里用这个双关语，表示她获奖时的心情。

开始动摇了美国社会的基础。

尽管如此，我是第一次感到我个人地位的脆弱，并开始怀疑，我是否还会有足够的钱为我和我的孩子购买食物。抛开对我本人命运的关切——或许部分原因正是出于这种关切——我开始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去探讨饥饿问题。

我开始到美国的其它一些城市去旅行，串小巷，访陋室，寻找饥民，与专家交谈，并发表调查报告。我在波士顿、芝加哥、华盛顿以及费城进行过这些活动。

接受新闻奖后，我回到华盛顿就很快得知，在这个国家的首都里，就有好几千人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些穷人仅以不够数的、大部分是一些只含淀粉质的廉价食物为生，因而发现因营养严重不足而虚胖的儿童，是不足为怪的。

我遇见一位有五个孩子的年轻母亲，她住在一座褐色沙石大楼的顶层的一个房间里，这座建筑物位于哥伦比亚特区西南部的 N 街。她自豪地解释道，她过去总是缺少食物，现在好些了，因为她如今根本不买水果或肉类吃。

我望了望她那些年龄分别为四岁、五岁、七岁、八岁和九岁的孩子们。屋子里光线暗淡，他们坐在地板上一声不吭，显得过于沉静。一个小姑娘腼腆地向我笑了笑。

“孩子们都吃些什么？”我问道。

“米饭”。她回答说，“只要我做了足够的饭把他们喂饱，他们从来不抱怨。”

饥饿不只局限在特区。位于马里兰州海茨维尔市贝尔克雷斯特路上的总统大厦是一座有九层楼的白色巨型建筑物。在那里，每天清晨四点半起，人们就开始排队领取食品券，尽管没有贴出告示或路标指示人们办事处的所在，也没有贴出通知说明需要什么样的必要资格，人们还是蜂拥而至。许多人空着肚

子等了一天，回家时也没有领到食物的希望。发放食品券这一计划是由农业部主持的，以便使那些够格的低收入居民能得到一些补贴，购买更多的食物和提高他们的食品水准。遗憾的是，这项计划经常做不到这点。

一个星期一早上六点，我坐在一张专门为等候的人而准备的直背木椅上，和我周围的人聊了起来。一些人向我解释，他们来之前都通过电话，并被告知：他们要等上六个星期才能被接见；或者在早上五点就来，或许能指望在“空闲”时受到接见。

一位坐在那里凝视着天空的妇女用手背擦了一下她的眼睛，她的嘴唇颤抖着。她四点半就到这儿了。“他们要我丈夫在这张抚养单上签字。”她指着一张表格说道。

“他肯抚养你吗？”一个人问道。

“不，不，”她说，“他几个星期前就不见了。他一直和他的女朋友住在一起，随后他又搬走了。我告诉他们我找不到他，他们说：‘好吧，我们可以延期，给你更多的时间去找他。’可我答应了我的孩子，今天回家时一定给他们带去吃的——从昨天早上开始，他们便什么都没吃到过。”

对于从那时起一直没吃过东西的孩子来说，她不用说，我们 also 知道那是多么长的一段时间了。坐在旁边的一位妇女连忙插嘴道，她认为这个妇女的孩子会理解的，因为每月总有三、四天，她自己的孩子也在住房周围走来走去，问什么时候他们能吃到点食物。“可我的孩子知道其中的究竟。他们对这已经习惯了。”这个妇女说。“他们知道，我们一定得等到取得更多的食品券时才行。”

“复活节期间，我想给孩子买几双新鞋。我晓得这就是说那个月我得少买食品，但我很想买几双新鞋。他们所有的鞋都破了，成了碎片。你可以理解，这不是想入非非，我只是不想